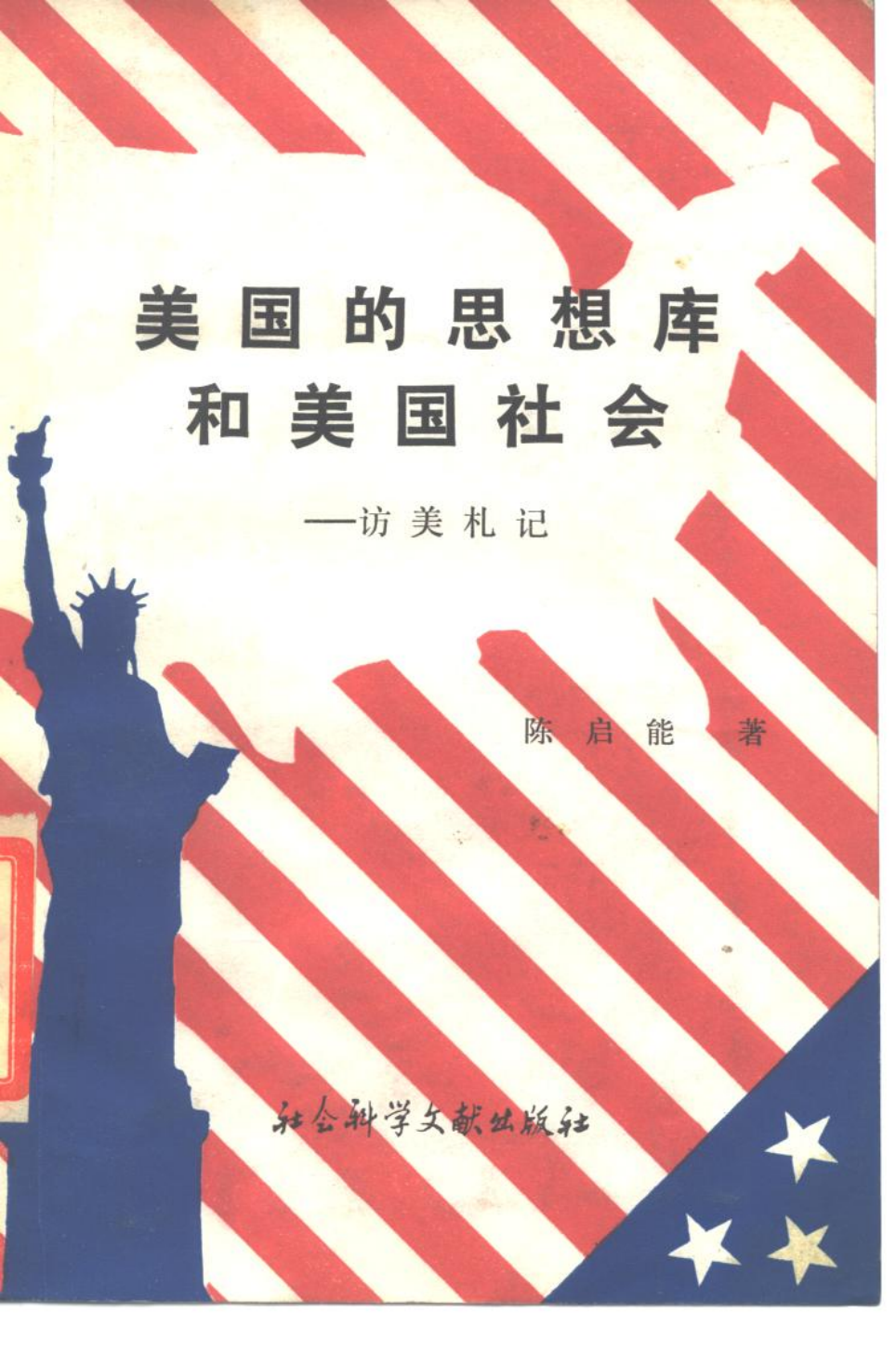




美国的思想库 和美国社会

——访美札记

陈启能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国的思想库和美国社会

——访美札记

陈启能 著

0725/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 1987

美国的思想库和美国社会

陈启能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社科文献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26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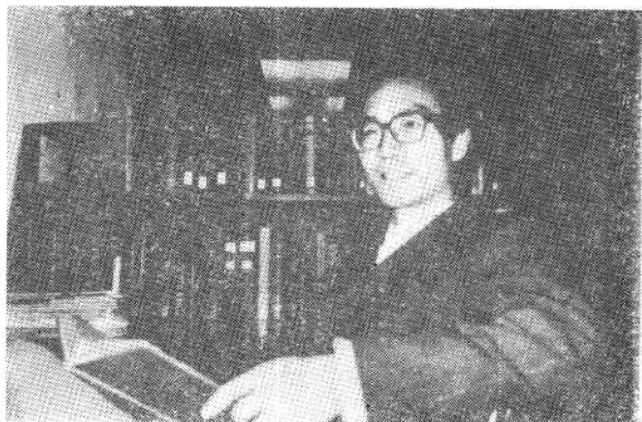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 001—6 200

统一书号: 3419·008

定价: 1.40元



本书作者在胡佛塔底层阅览室

目 录

写在前面.....	(1)
在胡佛塔的地下层.....	(4)
保守主义的“思想库”	(9)
赫伯特·胡佛与胡佛研究所的创立.....	(16)
里根政府的政策有一百个提出者.....	(20)
研究的多学科性.....	(27)
美国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33)
国际性的文献资料中心.....	(41)
近二三十年来的变化.....	(49)
“诉讼社会”	(58)
严重的社会问题.....	(66)
“性解放”的恶果.....	(74)
文明的分裂.....	(84)
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93)
友谊.....	(100)
查理士河畔的龙舟游艺会.....	(108)
炎黄子孙.....	(113)
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学位授予典礼.....	(119)

在平静的校园里	(123)
一幢“进步的学生宿舍楼”	(131)
听美国教授讲课	(135)
《美国的哥特人》——一幅全国性的人物肖像画	(140)
参观美国国家宇宙航空展览馆	(147)
圣马特奥中心公园的“维多利亚日”活动	(153)
赌城一瞥	(159)
“鬼节”趣闻	(164)
卡尔梅尔之夜	(170)

写在前面

从1984年2月初到1985年2月底，我在美国进行了一年多的访问研究，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阅读和收集资料，也去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等处。

我这次访美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苏联史。为什么要到美国去研究苏联史呢？乍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其实不然。美国对苏联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对这个课题展开比较大规模的研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但是进展却很快。据《纽约时报》1964年4月3日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只有几所主要的大学讲授俄国史，可是到1964年已有四百所大学和学院开设苏联史课程。从研究力量说，美国已有一支不弱的苏联史研究队伍。至于美国收藏的有关苏联史的图书资料（包括档案资料），那更是相当丰富，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借阅手续比较简便。因此，到美国去收集有关苏联史的资料，并做一点研究工作，是会有所收益的。

不过，我这本书并不是要写有关苏联史的问题。我要写的是美国本身。这可以说是我这次美国之行的副产品。尽管如此，却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酝酿的产物。也就是说，早在出访之前，我就准备在课题研究之余，有意识地对美国社会进行一些观察，随时积累一些素材，写一本有关美国的书。我是从事史学研究的，但我感到，研究历史不能一

头扎到古纸堆里去，任凭历史的尘埃封闭自己的头脑，以致丧失对现实生活中新鲜事物的敏感。历史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长河，其间的每一瞬间，对不同的时间来说，既是“过去”，又是“现在”，也是“未来”。这三者是无法分割的，而对每一个特定的史学工作者来说，其立足点应该是“现在”。李大钊早就说过：“无限的‘去过’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研究历史，其对象虽然是“过去”，归根到底，却是为了“现在”，甚至是为了“未来”；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现在”，为了创造“未来”。我们研究历史，可以有助于对现实的认识；反之，对现实的了解，又可以有助于我们透过迷雾窥见历史的真谛。因此，一个严肃的历史工作者，应该同时是一个现实生活的冷静的观察者、积极的参与者和热情的建设者，也应该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现实生活是无比地丰富多彩的，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人们渴望更多地了解现实，不仅了解中国的现实，而且了解外国的现实。世界各国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经常想些什么，他们的风俗习惯如何，他们的社会状况又是怎样的，有哪些美丽的名胜风光，……诸如此类的问题很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我们已经打破了过去闭关锁国的状况，出国留学、访问、考察、谈判、交流的人员越来越多，对外国实际的接触和了解也就随之增多。这是一件大好事。这不仅是我们顺利进行四化大业的必备条件，而且对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推进科学发展也大有好处。譬如我们搞世界史研究的，研究的对象本来就是外国，如果能有机会到国外去走一走，多增加一点感性知识，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一些，对研

究工作肯定会有帮助。总之，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大至四化建设、科学发展，小至满足生活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当代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都应该大力加强对外国的研究和介绍。这件工作需要很多的人来做，特别是有机会到国外实地观察访问的人。通过书报、影视，我们也可以了解外国，研究外国。但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实地考察的结果，亲眼看到的东西，哪怕只停留在表面，也仍有它独特的意义。因此，我很希望有更多的出国人员在公务之暇，能把自己感受的有关外国的情况写出来，介绍给大家。这肯定会有助于我们对国外情况的了解和研究。我想，这应该是一件符合时代潮流的很有益处的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决定写这本书，并且希望多少能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了解的情况有限，观察也很肤浅，浮光掠影，走马看花，偏颇乃至错误之处，恳请读者给以指正。

最后，我这本书的得以完成，要特别感谢美国亚洲基金会及该会的顾问袁伦仁先生，没有他们的资助和关怀，我这次访美根本就不能成行，自然就谈不上写什么“访美札记”了。此外，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得到国内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支持和鼓励。我也同样由衷地感谢他们，其中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一直敬为自己老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翰笙同志。

1985年10月24日

在胡佛塔的地下层

我在美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胡佛研究所的全称是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它是由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总统任期是1928~1932年）于1919年创建的。

赫伯特·胡佛于1874年8月10日出生于美国中部的衣阿华州的西布兰奇。他为什么要到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来创建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呢？原来他是斯坦福大学地质系1895年毕业生，并从1912年起长期在大学董事会里任职。胡佛的夫人（1875年出生于衣阿华州的沃特卢）卢·亨利·胡佛，也是斯坦福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只不过比她的丈夫晚三年。胡佛夫妇同斯坦福大学的关系还不止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就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圣胡安山上租赁房屋，住过一段时间。大战结束后，在1919~1920年，胡佛夫妇又在圣胡安山的山顶上建造了一幢住宅。赫伯特·胡佛从政以后，虽然他们只能间断地到这里来住上一个短时间，但他们在“名人录”中总把自己的家庭地址写成“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1944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妻子去世后，把这幢房子捐赠给斯坦福大学，同时为了纪念他的亡妻，还把它命名为“卢·亨利·胡佛故居”。这些情况足以说明，赫伯特·胡佛选择斯坦福大学作为他创建研究

所的地点就不是偶然的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胡佛研究所的创建同赫伯特·胡佛在海外的“矿业冒险”，其中包括在中国的活动，也是不无关系的。1899年2月10日，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里他未婚妻的家中，与卢·亨利·胡佛结成百年之好。婚后第二天，这一对年轻夫妇就启程远赴中国。赫伯特·胡佛在中国的开平矿务局任总工程师。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开平矿区被英军占领。这一事变的结果，是该矿督办张翼被迫签字交出矿权。赫伯特·胡佛作为英商的代表，直接帮助英人骗占了这个创办于1875年的我国的大煤矿，而自己则得以升任开平矿务局总经理。1901年下半年后，他又在英国比威克·摩林矿业公司任经理。他的足迹还遍及澳大利亚、缅甸、俄国、阿拉斯加等地的矿区。正是从这一段的冒险生涯中，赫伯特·胡佛积敛了大量钱财，成为许多企业的股东。很难想像创办一所研究所必需的资金与他的发迹无关。

胡佛研究所自创立以来有了很大发展。

现在的胡佛研究所主要由三座地面建筑物组成。其中最早建成的是建于1941年的胡佛塔。这座塔的建筑很别致，共高14层，除了底下两层和顶部有一层（第11层）开有窗户并设置办公室以外，中间一大段却没有几个窗户。难怪有人评议说，这塔的样子有点像是监狱。其实中间这一大段墙并不是用来囚人的，而是用来藏书的，这正是有名的胡佛图书馆的书库。

胡佛塔的东侧有两座楼。前面一座楼建于1967年，叫卢·亨利·胡佛楼，显然是用以纪念赫伯特·胡佛的妻子的。这座楼的面积共有6万平方英尺，地面上有两层，地下也有

两层。地面上的第一层主要是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收集中心 (East Asian collection)，第二层是办公室。地下两层是东亚图书收集中心的书库，上一层是日文书库，下一层是中文书库。

后面一座楼叫赫伯特·胡佛纪念楼，建于1978年，加上附属建筑（位于卢·亨利·胡佛楼与赫伯特·胡佛纪念楼之间的、供展览档案文件及学者们在休息期间喝咖啡用的陈列馆），面积共有10万平方英尺。这座楼地面上共有三层，主要是学者们的办公室。地下有一层，除会议厅外，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包括档案库和阅览室）和胡佛研究所出版社均设在这里。这个地下层的面积很大，实际上和卢·亨利·胡佛楼的地下层构成一个四方形，恰似中国北方的四合院，中间是一个露天庭院，叫胡佛庭院，庭院中间是一个小小的喷水池。这个庭院因与地下层相齐，因此也是处在地下的，但它又是露天的，因此白天可以充分采光。

有意思的是，赫伯特·胡佛纪念楼的地下层同卢·亨利·胡佛楼的地下层虽然实际上构成这样的四合院，但彼此之间并没有门相通。而赫伯特·胡佛纪念楼的地下层却有一条地下走道同胡佛塔的地下层相通。这样的建筑构思可谓别具匠心，既充分利用了地下面积，又使地面上各不相通的两座建筑物在地下有暗道沟通。这至少节省了人们来往于两座建筑物之间的时间，并且可以极大地方便人们运送图书。我常常看到胡佛研究所的图书管理人员推着运书车来往于地下走道上。他们如果要在地面上运书，那肯定要困难得多。

我所以要不厌其详地介绍胡佛研究所的建筑物，特别是其地下层，就是因为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大部分时间，正是在这些地下层（主要是胡佛塔的地下层）度过的。胡佛塔的地

下层设有现期报刊阅览室、复印室、缩微胶卷阅览室、一些办公室和一个大的研究阅览室。这个研究阅览室是专供来自美国国内外的访问学者用的，需要事先申请专座（carrel）。

胡佛塔的地下层，是我在美国这一年主要的工作地点，也可以说是我观察美国社会的主要立足点。胡佛塔高达285英尺，虽然远不及美国著名的摩天大楼，但在整个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却是最高的建筑。若能到胡佛塔的顶层去眺望，视野自然要开阔得多。但自1983年2月以来，胡佛塔由于修理，顶层停止开放。修理的项目主要是增设防火警报系统和新的取暖、通风系统。修理工程总共花费约一百万美元，直至1984年5月才竣工。1984年6月1日，胡佛塔顶重新对外开放，只要花50美分就可以乘电梯直登塔顶，饱览四周风光。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开放的当天，我就登临塔顶，举目远眺，周围景物果然尽收眼底。据胡佛图书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如果遇到大晴天，可以看见旧金山。斯坦福大学距旧金山约35英里，这样看来，视界不算不开阔了。但胡佛塔顶的开放，只是作为参观游览的一个项目，显然是不能在那里设专座的。至于胡佛塔第十一层的办公室，那是属于胡佛研究所所一级领导的，如胡佛研究所所长W·格伦·坎贝尔的办公室就在那儿。在胡佛研究所的整个逗留期间，我从来没有机会到那里去过。总之，我是只能呆在胡佛塔的地下层里来观察美国了。

从胡佛塔的地下层观察美国，这似乎有些可笑。但仔细想想，也不无好处。这个地方虽然空气不大好，没有空调设备，夏天也只是用一个大电风扇调节空气，但它或许具有别的场所并不具备的独特之处。记得有一位苏联作家访问美国回去后写了一本访问记，题为《一层楼的美国》。美国的高楼

大厦汗牛充栋，为什么要写一层楼的美国呢？这位作家可能认为，光写高楼大厦未必能反映美国社会的全貌，而从一层楼看美国，有时或许更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如果是这样，我所处的地下层比一层楼还要低，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些独特的东西呢？当然不是说越低越好，但至少也是一个特殊的角度。从这个角度看出去，是不是也有可能看到一些从别的角度不甚容易看到的東西呢？

在胡佛塔的地下层呆得时间长了，我慢慢地发现了它对观察美国来说所具有的特有的长处。我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地下层的研究阅览室和胡佛档案馆的阅览室，经常有来自美国各地和许多别的国家的学者来做研究工作。他们期限不一，不断更新，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这样就可以极大地扩大接触面，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学者广泛交换看法，获取各方面的信息。第二，胡佛研究所，以其在某些领域收藏的图书资料的丰富而言，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而以其研究水平，以及学术上、政治上的影响来说，在美国可以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如果能具体了解胡佛研究所本身，对我们一般了解美国学术界、知识界的某些方面，恐怕还是不无裨益的。而我之获得地下层研究阅览室的第13号专座，很有利于我去进行这样的了解。应该指出，在我之前，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收集中心（位于卢·亨利·胡佛楼）虽然也接纳过我国的学者，但我却是进入胡佛塔地下层从事研究工作的第一个中国学者，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鉴于上述，我决定，我的这本关于美国的札记就从胡佛研究所写起。

保守主义的“思想库”

胡佛研究所素以保守闻名。目前，它是同样以保守著称的里根政府的主要思想库之一。关于这点，我在到达美国之前早已听说过，在抵美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更是时有所闻。不论在美国西海岸还是东海岸，我所接触到的人们凡是谈到胡佛研究所的，无不说它保守，就连胡佛研究所本身的工作人员也并不都否认这一点。

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一个很有意思而又复杂的问题，这里没有必要涉及很多，但一般美国人是怎样对待它的却需要说一说。“保守派”，这个词来自拉丁文conservator，意即守旧者、保卫者。守旧、维持现状、守住已有的东西不使丧失，这就是“保守”一词的涵义。这样的涵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自然不会引起好感。这在美国，一般说来，恐怕也是这样。我本人就有过一些有趣的经历。有一次上英文课，老师介绍斯坦福大学的情况，介绍到胡佛研究所时就说它倾向保守。同学们听到这儿，因为知道我在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都自然地拿眼睛瞟我。老师注意到了这点，马上对我说：“请原谅！”这又引起了同学们善意的笑声。这当然是个误会。因为我虽然在胡佛研究所当访问学者，其实同研究所并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原来胡佛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有两种，一种是研究所出钱请来的，这些学者的研究工作纳入所的计划，而且可以有正式的办公室。另一种是像我这样的访问学

者，并不拿研究所的一分钱（譬如我，就是由美国的亚洲基金会提供资助的），因此对研究所也不负任何义务。这类学者往往是向研究所申请阅览室的专座，并且只是利用胡佛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图书资料做点研究工作罢了。不过发生在英文课上的这个小插曲恰好可以说明，在这位老师和同学们看来，第一，胡佛研究所是倾向保守的；第二，说别人保守总不是件愉快的事。这里顺便补充一点，在这个英文班上，除了老师是美国人外，同学们都来自别的国家。由此可见，持上述看法的人是相当普遍的，不仅限于美国。

另一次经历更能说明问题。那是在1984年夏天，我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遇到一位来自美国南部的富有的企业家。这是一位妇女。她同我初次相识。在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她半开玩笑地警告说：胡佛研究所可是一个保守的地方呀，你可要注意不要受其影响。我也笑着回答：不会的，我只是利用胡佛图书馆的资料做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位女实业家的话虽然带点半开玩笑的性质，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人们对保守主义的看法。我在胡佛研究所曾经遇到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访问学者。他同我一样，在胡佛塔地下层的研究阅览室里有一个专座。但他几乎从来不来这儿看书，只不过是过几天来看看有什么信件之类。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这儿看书。他回答说，他讨厌这儿的空气。这并不是指地下层因为不通风空气不好，而是指这儿的保守主义空气。因而，他宁愿去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看书。这当然只是个别的突出例子。但不管怎么说，上面这些例子可以表明人们对保守主义的一般态度。同时也说明，胡佛研究所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思想库”，这点可以说是公认的。正因为这样，胡佛研究所的一些领导人有时也不得不为自己辩解，以表明胡佛研究所并不

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保守。譬如，胡佛研究所执行副所长约翰·H·穆尔说：“我们所以显得保守是因为我们被置于一
般的学术生活、特别是斯坦福的学术生活的对比之下。”胡
佛研究所所长W·格伦·坎贝尔也说：“与美国的公众相比，
我们处在十分中心的地位。我们在这里具有的多样性，要比
你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别的一个思想库里能发现的都要多。”

照此看来，人们应该是不欢迎保守主义的了。然而，事
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能用过去“左”的指导思想占上
风时期那种简单的方法去理解它。过去，在我们习惯于把人
们机械地划分为左、中、右三类的情况下，“保守派”无疑
是属于右的一类。在当时，“右”是一个十分可怕的词，谁
都怕同它沾边，因而“宁左勿右”的做法十分普遍。在美国，
情况就不是这样。虽然如前所述，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
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褒词，但也并不因此就被视为是一种大
逆不道的、非要与之明确划清界限的罪恶。在西方，保守主
义不仅可以合法存在，而且还被一些政党或团体作为公开
的旗帜加以标榜。譬如，英国最有影响的政党之一就叫保
守党，在瑞士、普鲁士（后为德国）也存在过以保守命名的
政党。在美国，虽然没有保守党，但一般认为，共和党是倾
向于保守主义的，而民主党则倾向于自由主义。这种区别在
1984年两党为竞选总统而分别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
领中，也可以看出来。然而，在1984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
党的候选人里根和布什获得了压倒多数的绝对胜利。这次共
和党获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至少也说明，对待美国的政治
现象不能采取一种简单的态度，仿佛保守主义就绝对地不受
欢迎，否则就不会有人公开打出保守主义的旗号了。

1985年2月，在我即将离开美国之际，一位斯坦福大学